数字化时代下的精神之思

□ 赵 勇



徐兆寿将其评论集命名为《精神的维度》，似乎有一种与纷繁时代拉开距离的意味。该书讨论的都是与现实、文化、社会紧密联系的议题，在讨论的视野、方法和语言结构等维度上呈现出一种更为清醒的精神批判。全书以文学议题开篇，同时涉及影视、文化、社会、哲学、历史、伦理等一系列讨论，视野开阔，格局宏大，有着精准的价值论断、犀利的批判意识，以及对各种现象和文本的细致分析。

该书第一、二章题为“文学何为”和“文学的立场”，开门见山地对文学的本质功用提出质问，这在当代文学的理论和实践探讨中并不多见，当“存在即合理”变成“共识”，那么，一个存在了千百年的事物还需要去讨论它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吗？对于这一问题，作者先以三篇文章的篇幅探讨了当下文学批评的问题。他提出了文学批评应该具有的六种核心气质：感性、精细、优美、真诚、深刻、气广，可以确认的是这六点皆带有对当下的文学批评的强烈批判。这里的六个原则批判的就是那种理论先行、居高临下、言不及物的话语缠绕式批评。作为一个批评者，如果未能走进文学文本且与作品发生真正的情感关联，那么他所提出的批评即便理论深奥、逻辑自洽，在本质上也与文学作品本身毫无关系。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文学批评的两个维度，一个是文学的本体性，一个是文学的在场性。文学的本体性维度是根本性的，是文学批评的内在属性，关涉文学的学科秩序，也就是说批评者必须站在文学的立场，在文学的意义框架里进行。文学的在场性维度是关键性的，是文学批评的外在要求，它涉及文学的现实伦理。可以说，这两个维度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核心立场、学术起点、话语形态、叙事逻辑、理论边界和价值落点，为当下的文学批评确定了一个清晰的实践“导航”，也间接地为“文学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认识路径。

该书第三章讨论“电影的艺术精神”，在近年来的一些电影“大片”中，工业和技术代替了故事和人物，震撼炫目的特效代替了耐人寻味的细节，叙事的艺术让位于爽点的铺陈，这一切都让电影的艺术精神沦为速食的视听游戏，电影的艺术缺失本质上其实是文学性的缺失。那么，如何让电影的艺术精神得以确立，辅助甚至代替文学在这个时代承担某种精神高地的职责，则是当下绕不开的一个议题。作者在此从四个方面展开了探讨，包括人物形象、主题、细节和艺术性。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在文学中早已成熟，然而在电影中受时长所限似乎成了“难题”，但这显然不能成为电影难以塑造人物的借口，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其实很简单，就看电影的创作者是否“心中有人”且“目中有人”。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关键是要怀有对人物的悲悯之心，也就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仁心”，要把他当作活生生的、和自己有血肉情感联系的人来对待，而不是一个虚构故事中的“他者”。

其次是电影主题和细节问题。建构一个主题并能让人信服，十分考验电影创作者的能力和态度。《给阿嬷的情书》为何能以小博大，以低成本的投入获得口碑票房双丰收，核心就在于它建构了一个打动人心的主题，同时以完整的叙事细节撑起了这一主题，那就是人的情感、人的精神可以对抗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隔断。再次是电影的整体艺术性探索问题。表面上看，一部电影的制作成本巨大，很难不考虑其商业回报的问题，如果仅仅考虑艺术上的探索而不考虑受众因素，则难免会导致创作者难以为继的局面。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近年来一些国产电影，如《我不是药神》、《哪吒》系列、《第二十条》、《南京照相馆》，以及《给阿嬷的情书》等，都是在艺术性、社会价值和商业票房上获得成功的佳作。因此，电影艺术性的突破不仅是电影形式的先锋探索，也可以是紧贴现实、紧贴人物、紧贴时代的艺术表达，核心在于如何理解“艺术性”这一关键词，艺术性不是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美学，而是基于时代之上的一种扎根现实的创作态度、一种“心中有人”且“目中有人”的叙事理念，以及一种在突破中取得“平衡”的美学精神。





该书第四章讨论“爱的价值”。如何重建“爱的价值”呢？作者从美、道德、欲望等维度探讨了这一议题。首先是美的维度，“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不美也”，当美颜滤镜遮盖了“不美”之后，美就丧失了它的标准，或者说美不复存在了。重建“美”的维度，也就是要先重建“不美”的维度，分辨那些同质化的、滤镜加持的所谓“美”实为“不美”，进而才能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美”，由这样的“美”激发和衍生的“爱”才是积极的“爱”。其次是道德的维度，道德是爱的守护者和“防火墙”，它不是外在的规则框架，而是内在的自我约束，它通向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性文明本质。第三是欲望的维度，欲望常常让爱归于一种简单的冲动和宣泄，这就需要美和道德的制约，在理想的状态下，欲望、美和道德可以做到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第五章回到了本书的主旨“精神的维度”，作者讨论了一些“形而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讨论都立足于一个哲学中的永恒命题，那就是“人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在哲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经典的论断，如笛卡尔的“理性主体”，尼采的“未定型超人”，萨特的“自由的存在”，卡西尔的“符号的动物”，拉美特利的“复杂机器”，以及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等，这些论断从不同维度都在揭示人的复杂性。那么，在当下时代继续发出这样的诘问其意义何在？作者在书中承续了福柯的观点，“人的终结”，在一个知识过剩、信息冗余、时间和空间都被极度压缩的时代，所有的知识、信息和数据都指向“人”，但真正的“人”却变成了一种模糊的存在。这一讨论在当下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有必要。然而在当下，所有人都处于一种“透明”的数据网络当中，人工智能已经能够按照人的方式“思考”，然后创作和生产出大量语法完整、结构合理、条理清晰的文字和影像内容，此时，人的“知识化”已经升级或者变异为“数据化”。

《精神的维度》以“回家与重建”结尾，这并非简单地回归到农业文明的传统中去，而是在经历了技术理性的祛魅、消费主义的席卷与“人的终结”之后，一种清醒的精神“返乡”。作者以五辑篇幅，从文学批评的错位、电影艺术精神缺失的论断，到爱的价值重估，最终指向“人是什么”的根本性追问，而“回家”，是回到文学和艺术应有的人文立场，“重建”，则是在数字化浪潮中为人的情感、道德与思想重新筑基，这让全书的批判有了清晰的价值落点，也使精神的重建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成为一个新的起点。

（《精神的维度》，徐兆寿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四时流转的西部生活长卷

□ 梁增凯

在散文集《梨花消息》中，作者王选以有温度的“感性分配”书写，在时间感受、饮食味道和民俗体会三个维度上，重新激活我们对世界的感性把握。所谓“感性分配”，是关乎感受力的重新划分，它试图将那些被现代性话语所压抑、遮蔽、边缘化的身体经验重新纳入可见与可感的范畴。因此，《梨花消息》并非一本简单的风物散文集，而是一次对现代感性秩序的温柔抵抗，一种重建感受的共同体的文学尝试。

书中依照春、夏、秋、冬四季分章，记录了从二月二炒豆到小满麦香、从秋后洋芋到雪地冬花的四时流转，将对时间的感知融入现实的生活经验之中，暗含着一种对时间感的重塑。作者写道，小满节气，麦穗日渐饱满，人们对日子就产生了盼头，中国人对粮食的喜悦莫过于小满尝麦香。此时，读者不仅是用眼睛看这段文字，而是用鼻子闻、用身体感受那个特定的时间节点。正如学者谢有顺指出，读《梨花消息》可以“体悟时间的味道”。作者让我们慢下来，去等待一树梨花的开放，去期待一锅洋芋的焖熟。这种慢是坚持用自己的身体节奏来丈量生活。

如果说时间维度上的感性分配关乎何时感受，那么饮食维度则关乎如何感受，关乎我们如何通过身体的感官经验与这个世界建立联系。王选在《梨花消息》中写食事，被认为这是一部有“实感”的“人间食事志”。所谓“实感”，意味着它不是对美食的文人式雅玩，不是对菜谱的博物式记录，而是将食物还原为一种切身的、带着体温的身体经验。作者写吃扁食，写的是备菜时厨房里“吐着泡，哈着气”的沸水和“白马一般”的白烟；写秋后洋芋，写的是那一锅温腾的热气。滚沸和温腾是食事对生活的具象，它展现的不仅是温度，更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带着生命力的暖意，是身体对食物的直接感受，也是食物对身体的温柔抚慰。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书写的不是精致的宴席或珍稀的食材，而是西部大地上最寻常的食物：洋芋、麦子、扁食、草药，这些食物的寻常性恰恰是其感受力的来源。当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锅洋芋，作者书写的不是美食，而是生存本身，这展现出人们如何用最朴素的食物维系生命的韧性。书中将饮食还原为身体的需要，也就是说，饮食的意义关乎着身体如何被喂养、被照顾、被安慰的深刻内涵——我吃，故我感受；我感受，故我存在。

《梨花消息》中书写了大量西部民俗——龙抬头、炒豆、民间药方……草药被具象化为亲手采摘、熬煮、服下，体会那股苦涩如何在身体里转化为力量。有人将这本书称为“一帖给当代人的温柔药方”，这个比喻极为精准。“药”的性质是治疗，而《梨花消息》所治疗的，正是现代人的感受力匮乏症。民俗保存着传统社会对身体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如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什么节气吃什么食，什么病症用什么药……这些知识不是书本上的教条，而是日常经验沉淀下来的智慧。作者的写作，正是要让民俗重新回到身体，去闻麦香，去摸洋芋的温度，去听炒豆的声音，去感受草药的苦味在舌尖化开。这种对民俗的身体性书写，是对文化记忆的钩沉，也是对标准化、同质化生活方式的抵抗。



感性分配的最终指向，是感受的共同体的建立，其中暗含着在身体经验的共享中形成的情感联结。评论家何平认为，《梨花消息》是“散文写作的一次温柔返乡”。这里的“乡”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感受意义上的家园——一个让我们可以重新学习如何用身体去感知、去回应、去爱的所在。而作者的文字之所以温柔，是因为它以一种邀请的姿态，让我们重新走进自己的身体，走进那个被我们遗忘已久的可知可感的世界。因此，《梨花消息》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描绘出关于西部风物的文化记忆，还在于它重新教会我们一种感受世界的方式。

（《梨花消息》，王选著，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读书

一卷书影，半世人生

□ 刘 燕



《书里人生》，一个温润又厚重的书名，道尽读书人一生的栖心之所。作者余新忠拥有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研究经历，现任南开大学教授、历史学院院长。他长期从事医疗社会文化史与明清社会史研究，身兼多项学术职务，入选多项国家级人才项目。数十年伏案治学，其行文却朴素淡然，将读书、治学、观世的感悟，都一一纳入《书里人生》中。所谓“书里”，既是典籍文史的方寸天地，也是烟火人间的人生况味。

本书归属“雅学堂丛书”第三辑，丛书由浙江大学刘进宝教授主编，汇聚国内文史社科领域一众知名学人。丛书收录众多学者随笔文集，作者皆数十年在史学领域潜心钻研。

除却个人求学往事，文中还记录了真挚的学术交谊。书中《专业眼光 学者情怀——纪念梅莉老师》一文，让我感触至深。梅莉是地方学报编辑，平日多有学术约稿、书信往来。在国内医疗史、瘟疫史研究尚属冷门的阶段，两人因相近的学术志趣心意相通。后得知梅莉骤然离世，作者满心震惊与惋惜，特意撰文追忆这位学术同道。这份纯粹的情谊、相互的尊重，让我们看到一位学术大家谦和坦荡的胸襟。

同时，作者慷慨地分享自己的治学经验。在《虚心求实 真诚投入——博士论文撰写体会点滴谈》一文中，余新忠毫无保留地分享了博士论文选题、研究与写作的经验：选题要立足既有积累、紧盯前沿动态；动笔前务必夯实理论基础，树立明确的问题意识；同时要预留充足时间梳理文献、潜心研读。他坦言，治学没有一成不变的捷径，但虚心、求实、真诚投入是永恒的准则，一分耕耘，终有一分收获。

读《书里人生》，就像与一位温厚的长者促膝长谈。他不急于输出观点，而是缓缓讲述自己如何一步步走进历史，如何在书海中安放人生。书里的每一篇序跋、每一段回忆，都是他治学路上的脚印，串联起一位历史学者的初心与坚守。这里有学术的严谨，也有人情的温度；有对过往的回望，也有对后来者的期许。总之，《书里人生》梳理的是作者半生的治学轨迹，梳理的是他对生活、对学问、对生命的思考。它跳出了枯燥的学术理论，将学者的人生感悟、治学经验、待人之道融为一体，既有专业深度，又有人文温度。

（《书里人生》，余新忠著，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动态

长篇小说《古玉人间》出版

近日，作家陈自仁的长篇小说《古玉人间》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描写古玉收藏世家四代人悲欢离合的作品——明朝肃王后裔、著名古玉收藏家朱尚珩去世时，将手稿《古玉八百谱》传给嫡孙，一生收藏的古玉却不翼而飞。一场惊心动魄的古玉争夺战由此拉开帷幕。作品以民国年间的社会生活为背景，展现了古玉收藏世家四代人的恩怨情仇与生死离别，揭示了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书中善与恶的较量令人叹为观止，搜寻古玉的离奇经历让人惊心动魄。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古玉藏家、东家伙计、护院拳师、古玉贩子、盗墓奇人、军政要员等一批艺术形象，全书情节跌宕起伏，结局出人意料，发人深思。

除了扣人心弦的故事，书中还有57幅古玉彩色插图对应相关情节。书中详细地讲述了这些古玉的发现经过，并对其材质、雕工、造型、纹饰、沁色和包浆等作了精彩的描绘，进而赋予了全书更深的文化内涵。（王 鄯）

诗集《高原辞》出版

近日，甘肃诗人花盛的诗集《高原辞》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诗集收录了诗人近年来创作的诗作，由“高原蓝”“草木情”“这些年”“时光里”“洮河畔”五辑构成。从甘南草原到洮河岸边，这些带有泥土味、记录生命的诗作，既是地域文化的书写，也是精神海拔的丈量。

诗集《高原辞》以青藏高原的苍茫与澄澈为底色，构建出一片超越地理意义的诗意空间。诗人怀着对万物有灵的体认和敬畏，以俯身大地的谦卑姿态与向内探索的清醒，通过细腻而富有张力的语言，抒写高原之上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壮阔图景。诗行间既承载着对故土血脉的深沉凝视，也蕴含对生命本质的深刻叩问。作品在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既保持批判性的审视，又以诗性智慧传承文化根脉，展现出超越地域性的人文关怀，呈现出诗人在诗性文本上的锐意探索，以及其独特而深邃的诗歌精神。（王 鄯）